

中國近世士人筆下的兒童健康問題

熊秉真*

摘要

自宋代以後，因傳統幼科發軔，故有關兒童健康的問題，有幼科醫書、醫案、醫方之討論，代表當時專業人員的認識和記錄。然而檢視此類材料，我們心中常不禁興起一種疑問：除了專門以解決兒童疾苦為業的幼科醫生之外，一般人對兒童健康到底有多少瞭解？

爲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只有遍閱近世中國士人之私人及傳記性資料，披沙揀金，看看這些常人筆下是否曾經留下任何有關兒童健康的消息，如果有的話，此等非專業人員對兒童疾病的認識如何？而對兒童病痛多半採取何等的對策？因爲他們的了解和態度，相對於幼科醫者，反映了當時兒童求生存的健康環境中很重要的部分。而且，從健康史和社會史的角度而言，這些消息，算是反映兒童健康的「無意史料」——當時人留下這些記錄時，其關心的重點並不在健康——因而彌足珍貴，經過細心的解讀，可以讓我們一窺現代以前，一般中國家庭及兒童健康世界之一斑。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近世士人筆下的兒童健康問題

熊秉真

- 一、常人留下之健康記錄
- 二、私人傳記中所見之兒童疾病
- 三、一般家庭處理兒童健康問題的方式
- 四、兒童健康的殺手
- 五、傳統社會對兒童健康與疾病的認識與態度
- 六、結語

一、常人留下之健康記錄

在著手分析這些常人所留下的有關兒童健康的資料以前，我們應該對這整批材料有進一步的瞭解，思索：這些記錄是在什麼情境下留下來的？它有沒有什麼特徵？包括那些內容？

舊時中國家庭或個人並沒有保持健康記錄的的習慣，一般人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動機，要記下兒童成長過程中所罹之疾病。只有少數的傳記材料，在記載一個人幼年的遭遇時，提到某些與健康相關的經驗。所以我們在閱讀，運用這批史料時，必須意識到這些材料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留下來的，不是一個普遍的記錄。當時曾經發生於這些個人童年中的健康問題，有些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有些則完全不見諸傳記之記載。而且，在留有若干記錄的一個家庭中，也不是事事都提。

他們很可能記下了有些兒童所遭病痛，而對家中另外一些孩子的疾苦則完全略而未及。

這些有關個別兒童健康的資料，明清傳記中偶或可見。而清中葉（十八世紀末）之後所見更多。可能與此後個人傳記內容日豐，對童年部分載錄漸詳也有關係。這些傳記中之所以提到某些與健康有關之消息，大致有二類，一類是一般性地談到此人自幼身體強弱之狀況，另一類是提到某些特別的健康上的事故。其用意，除了略為說明某人先天體質稟賦如何之外，多少有些慶幸此人幼來「遭難不死」的意思。因為疾病就像一種幼時所遭遇的「特異經驗」一般，若能逢凶而化吉，有驚而無險，倖免災厄，或者代表此人活來不易，或者對其未來人生代表一種祥徵。因而幼兒罹疾病而癒，除了感念母親照顧之勞外，有時也認為是得鬼神祖先之助。

在這種心理之下，我們見到的傳記中有關兒童健康的記錄，遂有「報憂而不報喜」之一特徵。對於兒童正常健康成長發育之情況，日常之飲食，睡眠，運動，隻字不提。只有在孩子不幸罹病受苦時，才會略提其遭遇經過。

從這些不完整的記錄中，我們綜合起來，大致可以瞭解三方面的消息：一是當時兒童所罹之疾病，及一般人對兒童疾病的認識；二是當時家庭對兒童疾病所採之對策，及其反映的社會上對處理兒童健康問題的態度；三是當時兒童因病致死的事例，及其所代表的兒童健康狀況指數之一。此三方面之消息，得來不易，今分述於下。

二、私人傳記中所見之兒童疾病

（一）記錄中所見之兒童疾病

（1）消化道疾病

傳統社會中，消化道和呼吸道的問題，是兒童常患的疾病。舊時中國雖無消化道疾病之稱，但記載中卻常見兒童為腹疾、吐、瀉所苦。崔述（1740-1816）在考信錄附錄中自謂：「十四、五歲時，嘗得腹疾，先孺人百方為之營救，竟以漸愈。」⁽¹⁾這腹疾的症狀如何，崔述未加細談，但兒童因飲食不適或外物感染，導致消化道發炎，或出現吐、瀉，是很容易發生的事。崔述的腹疾，曾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也許是慢性的消化道發炎。文祥（1818-1876）謂其於十一歲那年，「

(1) 崔述，《考信錄附錄》，卷一，頁10。

又患胃熱咳血」，則似乎已有潰瘍的現象。而且到了第二年夏天，「又患翻胃證，食後即吐，冬初始愈。」⁽²⁾此類胃腸疾病，當時並無有效療法，常拖成慢性消化道問題。

黎培敬(1826–1882)自言三歲時，「每反胃吐乳，先祖贈公憂之，用葯嘗加厚樸少許。」⁽³⁾幼兒反胃吐乳，影響正常飲食，家中長輩當然深為擔憂，思以自知之處方為之調治。也有的兒童腸胃不適，似與飲食習慣有關，家人遂試為忌口，而舊時中國對控制飲食最常採取的辦法，是避免葷腥。如張大千(1899–1983)幼年「翻胃嘔吐」，家人認為是沾葷腥所致，遂令其自幼吃素。⁽⁴⁾

至於兒時誤食或貪食某些食品，導致短暫的吐瀉，也經常發生，但數日即過，算是比較不嚴重的情形。楊一峰自謂幼時一次隨母歸寧，趁家人不注意，爬上後園的大杏樹，一口氣吃下了十四、五個正熟的大白杏，待母親發現，「下得樹來，因為吃得過多，感覺肚子疼痛，結果瀉了三、四次了事。」⁽⁵⁾

(2) 呼吸道疾病

傳統中醫常以「痰疾」稱呼吸道的毛病，民間因亦仿此一詞。但仔細考察彼等所謂痰疾之症狀下，似常夾雜其他胸腔內器官問題，甚至神經方面的病變。像沈兆霖(1801–1862)自稱六歲時「有痰疾」，然隨又言「時患厥逆」，「發厥時，身仰後」，常連所坐高椅「並椅俱踣」。⁽⁶⁾其症候應不單是痰塞使呼吸不能順暢，痰疾只是表徵，時患厥逆則疑似小兒癲癇之類的毛病。

此較典型的幼兒呼吸道問題，是咳嗽不停。如陳澧(1810–1883)三歲時，「欬嗽幾死」。⁽⁷⁾久咳不愈，演為支氣管炎或者肺炎，對幼兒生命威脅極大。但過去中國並無此方面的知識，到二十世紀初以後的傳記文字中，因有現代醫學詞彙與觀念引入，才有此類說法。如鍾明志(1892–1956)自謂「兒時每月發一次氣管炎，診為肺部太弱，須滿四歲才能完全康復。」⁽⁸⁾

另外一項與呼吸道相關的疾病，就是兒童的氣喘，傳統稱為病喘或者病哮。

(2) 文祥，《文文忠公年譜》，頁4–5。

(3) 黎承禮，《竹閒道人自述年譜》，頁3。

(4) 關志昌，〈張大千多采多姿的一生〉，《傳記文學》卷4期25，頁38。

(5) 楊一峰，〈童年樂事〉，《傳記文學》，卷1期5，頁33–34。

(6) 沈兆霖，《沈文忠公自訂年譜》，頁2。

(7) 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頁3。

(8) 鍾明志，〈我的回憶〉，《傳記文學》卷17期3，頁12。

徐肅(1810-1862)幼年時即有「病哮」之苦，當時似乎也無任何有效的對策。(9)

(3)天花

天花，傳統中國亦稱爲「痘」，是近世威脅兒童健康最爲嚴重的傳染病之一。罹患者死亡率相當高，即使僥倖熬過，奮鬥的過程也十分辛苦，而且常有併發症發生。金忠潔(1610-1644)五歲時「發痘，得逆症，百藥罔效，勺水不入者數日，氣垂絕。」後來據說是得異僧之佑，才渡過險關，漸有起色，不過也拖了一個多月，才慢慢痊癒。(10)明清傳記資料中提到兒童患痘的事例不少，詳略不一，但均謂罹者深爲所苦。李殿圖(1738-1813)九歲那年「出痘」，遍體勻圓飽綻，甚苦之。(11)家中有兒童罹病，並無有效醫藥之助，多半靠母親或家人耐心照顧調養，乃得熬過難關。孫星衍(1753-1818)九歲時「出痘花，幾危」，即賴其祖母「許太夫人，金太夫人抱持不眠者兩旬始愈。」(12)王先謙(1842-1917)生始八個月，即「患痘瀕危」，亦因其母「備極艱劬，遇救得活。」(13)

明清社會已知「痘疫」是一種傳染性疾病，民間行醫者亦各有一些偏方對付，雖然並不一定有可靠的效果。張峯(1761-1829)三歲那年，痘疫大行，街號巷哭者相繼。不久，張峯「亦患痘，顆粒曾累，體無完膚。」當時地方上有位醫師見其症狀，「謂是痘將內陷，恐不可治。」要他的家人將他「姑臥之地，藉土氣以禦燥火。」當時據謂張峯已奄奄一息，家人不得已遂真的把他放在地上躺了七天七夜，他的母親亦隨之「臥於地者七日夜，哺以米汁藥液，憂愁涕泣，殆無寧刻。」到後來才漸有生意。(14)駱秉章(1793-1867)在他六歲那年三月，出天花，「幾至不測」，後來據說是因恰有姻親到省城找人開了補藥，「始得保全」。(15)

因爲對天花一症並無特殊療法，不少人家於孩兒遭此病變時，即轉而求諸宗教鬼神之助。文祥(1818-1876)，在三歲那年冬天，出天花，自以爲過程極爲順利，事後才聽母親說他的祖母「爲予焚香拜佛，額幾腫。」(16)李根源(1879-1965)在十一歲那年十月，出痘。最初，是家中三個妹妹先後得痘，最後終於傳給了根

(9) 徐肅，《敝帚齋主人年譜》。

(10) 金鏡，《金忠潔年譜》，頁2。

(11) 錢景星，《露桐先生年譜》，頁6。

(12) 張昭南，《孫淵如先生年譜》，頁1-2。

(13) 王先謙，《葵園自定年譜》，頁4。

(14) 鮑鼎，《張夕庵先生年譜》，頁2。

(15) 駱秉章，《駱秉章先生自敘年譜》，頁3。

(16) 文祥，《文文忠公年譜》，頁1-2。

源，但他「上漿時忽漿收色黑，昏沈不醒，狀至險惡。」群醫束手之下，其祖母乃「虔誦觀音經，愈三日，」據說其「漿忽突起，色轉紅，得以治愈。」⁽¹⁷⁾鬼神宗教之外，有些家人亦信夢徵可救危兒。劉景山(1885-1976)自謂「六歲染天花症，病危。」此時其母夢桂花開放，芬芳滿室，保姆盧媽亦得同夢，其後景山之病竟亦轉危為安。⁽¹⁸⁾

幸而熬過天花之劫的兒童，事後多仍不免留下一些後遺症。其中最輕微的，是身體上留下深淺大小的疤痕，俗稱麻子。舊時不論男孩女孩，落得麻臉，都可能遭人譏笑，尤其常構成婚姻上的困難。楊仁山(1837-1911)幼時與之訂親而未過門的女孩，即因在家鄉出天花，全身落疤，而臉上更重，父親即來詢問是否要改變婚約。⁽¹⁹⁾李根源出痘後落得「面麻」，⁽²⁰⁾當時人均知皮膚上的疤痕會因被抓而更嚴重，卻不能完全禁止孩子都不抓動。黃季陸(1899-1985)四歲時出天花，當面部發出無數痘疤時，即因「任性把他抓得稀爛，雖然過了痘痲關不曾夭折，卻形成了一個既醜又麻的小人物。」自謂幼小的內心籠罩著一種自卑的陰影。⁽²¹⁾因為社會上的訕笑，即使疤痕並不明顯，兒童心中仍相當自覺。劉健群(1902-1972)也說「因為幼年出天花，臉上還留下幾點不十分看得出的小麻子」，而覺得自己「說起美觀體面，真正一無是處。」⁽²²⁾

其實天花肆虐，在幼兒身上造成的傷害往往比麻面更為嚴重。不少人知道顧炎武(1613-1674)自幼左眼異常，有人說是有點斜視，有的記載則謂瞎而不能視，其實就是他三歲時患痘致危，愈後所遺下的後遺症。⁽²³⁾當時也有一些事例，提到天花餘毒事後會凝聚患兒體內某些部位，造成潰膿的現象。吳榮光六歲出痘，據謂即因「遺毒未盡，聚於右腿，腿生腐骨。」經用針灸法治之，半歲後，腐骨始出而愈，但在出腐骨之處，仍留下了「寬寸許，長二三寸，深五六分」的疤痕。⁽²⁴⁾完顏崇實(1820-1872)三歲時出痘，結痂後，「餘毒發於喉間，左右各一，危甚，」多日後，膿潰方愈。⁽²⁵⁾陳濟堂(1890-1954)記其長兄濟華，年七歲時出痘

(17) 李根源，《雪生年錄》，頁6。

(18) 劉景山，《劉景山自撰回憶錄》，頁41。

(19) 趙楊步偉，「我的祖父」，《傳記文學》，卷3期3，頁17。

(20) 李根源，前引書，頁6。

(21) 黃季陸，「我難忘的仁慈的父親」，《傳記文學》，卷9期4，頁33。

(22) 劉健群，「艱困少年行」，《傳記文學》，卷14期1，頁82-83。

(23) 李曦，《顧炎武》，頁5；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頁4。

(24) 吳榮光，《吳榮光自訂年譜》，頁3。

(25) 完顏崇實，《惕齋年譜》，頁2-3。

，「毒落其足，竟成殘廢。」⁽²⁶⁾

明清時中國人對於預防天花已發展出一種初步的防疫辦法，即以濕漿或痂皮製成「人痘」，由兒童鼻孔吹入。此方法雖為許多兒童成功地得到防疫效果，但施行稍一不慎，或漿苗效力太弱，仍會造成傷亡。故直到十九世紀末，許多民眾對之仍持戒慎之態度。黃季陸即謂幼時鄉下家人已知有傳統吹苗之法，但卻未為他種人痘。⁽²⁷⁾當時在沿海市鎮，已有西方傳入牛痘法，且有臨時設立的施種牛痘局。比較講究的家庭，還特別請醫生到家中為孩子種痘，魯迅(1881-1936)三歲時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種的牛痘。⁽²⁸⁾

(4) 季節性疾病及急性傳染病

舊時中國家庭已注意到，兒童疾病常與季節之更替有關，而四季中，以夏季最常發生，春秋次之。加上幼兒夏季罹病，常出現高燒現象，故傳統又以「熱疾」或「熱症」統稱此類疾病。一般民眾並不確知熱症因何而起，常將之附會於兒童當時所進行之其他活動。李殿圖的傳記資料中說他三歲時「以穿花捕蝶，得熱疾，幾殆。」⁽²⁹⁾吳榮光在十八歲那年三月，亦因「得熱疾，幾殆。」⁽³⁰⁾可見這類熱疾對當時少年及幼年人口健康，威脅相當大，而罹患者年齡愈少，危險愈高。聞一多(1899-1946)自謂「一歲多的時候，生了一場大病，叫『熱病』」，險些送命，他的祖母為其裝殮的衣鞋都準備好了。⁽³¹⁾

從這些記載中反映，人們也知道這些夏秋間的流行病，與地方水災有密切關係。徐燾十二歲那年，當地「秋七月，大水，瘟疫作。」⁽³²⁾此外，它還容易發生在多人聚集的城鎮。唐文治(1865-1954)十八歲那年七月，隨父赴金陵省試，並遊書肆，乃「熱患暑病」。⁽³³⁾

當時兒童在夏天容易感染的疾病中，有些是皮膚病。黎培敬六歲時，「盛暑

(26) 陳濟堂，「陳濟堂自傳稿」，《傳記文學》，卷25期3，頁8。

(27) 黃季陸回憶「三四歲時，種牛痘的辦法在我家鄉尚不會有，一般都是用藥苗從小孩的鼻孔吹入。由這種方法處理，當然是經過十分的險惡，稍為不慎，幼孩便因而夭折了。」他自己終因家人未予種痘，而於四歲時患了天花。見黃季陸，前引文，頁33。

(28) 魯迅於文中曾提到，幼年時「種牛痘的人固少，但要種痘卻也難，必須等到一個時候，城里臨時設起施種生痘局來，才有種痘的機會。我的生痘是請醫生到家裡來種的。」見李何林，《魯迅年譜》，頁8；復旦大學，《魯迅年譜》，頁4。

(29) 錢景星，前引書，頁2-3。

(30) 吳榮光，前引書，頁3。

(31) 季鎮淮，《聞朱年譜》，頁3。

(32) 徐燾，前引書，頁5-6。

(33) 唐文治，《茹經自訂年譜》，頁2。

，患頭瘍。」⁽³⁴⁾葉恭綽(1881-1968)六歲，「夏，病癩，垂危，二閱月始愈。」⁽³⁵⁾瘍和癩，指的都是一種皮膚疾病。但多在夏季困擾兒童的，仍以胃腸病和各種急性傳染病為多。陳衍(1856-1937)三歲時，「常患腹痛，七八月颱風起時尤甚。」⁽³⁶⁾而季節性疾病除了盛行夏季，亦有部分出現在春秋二季。伍受真(1901-1987)十五歲那年春天，「患痧麻症，幾殆。」⁽³⁷⁾李光地(1642-1718)十七歲時，「值秋熱，病痢幾殆。」⁽³⁸⁾

如上舉部分例證所示，近世傷害兒童健康的季節性疾病中，有許多是盛行於暑熱之時的急性傳染病，痢疾，瘧疾，白喉等。陸寶忠(1850-1908)六歲那年六月，染患「瘧疾甚劇」，到八月方小愈，後曾拖延成為久病不愈的老瘧（當時稱為「店」）。⁽³⁹⁾瞿中溶(1769-1842)自謂十八歲那年十月初起，「患間日瘧」，纏綿三閱月，逼歲除始就痊。」而且此後形容瘦弱，時有寒熱頭痛之患。⁽⁴⁰⁾傳統稱為喉痧，十九世紀末以後知為白喉的，也是當時常威脅兒童健康的一種急性傳染病。李宗侗(1894-1970)自謂幼年時曾「被染白喉，聲啞不能說話。」⁽⁴¹⁾李先聞(1902-1976)亦謂少年時曾發高燒，被診為患白喉。⁽⁴²⁾

然而對於這些威脅家中兒童生命的季節性疾病，直到十九世紀末，一般人的瞭解仍非常有限，除了注意到其常出現在夏季，且多能傳染之外，對其病因及防治之道，幾乎一無所知。楊步偉(1889-1981)於其自傳中曾描述一場急性傳染病，在短短的十幾天內，傳上附近的十一個孩子，奪去了七條性命，並使一人瞎了一隻眼睛，但是家人和醫生對扼止或控制這場疫疾，卻拿不出有效的辦法。對疾病本身，有的醫生指為腥紅熱，也有醫生說不出是什麼疾病。⁽⁴³⁾

(5)耳、目、齒、皮膚、腳氣等雜症

除了上述消化、呼吸道疾病，天花、季節性及急性傳染病，是近世威脅兒童健康的幾種主要疾病外，還有耳、目、齒病、口吃、皮膚、腳氣等雜症，時為健

(34) 黎承禮，前引書，頁3-4。

(35) 《葉恭綽先生年譜》，頁2。

(36) 陳聲聲，《候官陳石遺先生年譜》，頁13。

(37) 伍受真，《受真自訂年譜》，頁5。

(38) 李清植，《李文貞公年譜》，頁12-13。

(39) 陸寶忠，《陸文慎公年譜》，頁66。

(40) 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頁3-4。

(41) 李宗侗，《從家塾到南開中學》，《傳記文學》，卷4期6，頁45。

(42) 李先聞，《一個農家子的奮鬥》，《傳記文學》，卷14期5，頁12。

(43) 趙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卷11期1，頁49-50。

康兒童之困擾，傳記資料中偶亦可見。沈兆霖六歲後「耳常流水，聽不聰」，過了十歲以後才愈，可能是一種復發性的耳炎，因拖延時久，終致破壞其聽覺。(44)

關於眼睛和視力方面的毛病，因為會影響兒童閱讀乃至未來進學之前途，更易引起士人家庭之重視。兒童眼睛或視力上的問題，有些似乎是先天性的，據謂邵晉涵(1743-1796)生來「左目微眇」，眇即是一種眼病。(45)楊守敬也說他的三弟自幼聰穎，「惟目神不足，數丈外不見人，向夕即同瞽者。」可能是一種天生的弱視或夜盲。(46)但是有些孩子眼睛視力出了問題，則純為後天罹疾而致。前文曾及顧炎武三歲後「左目為眇」，即為罹患天花所遺。(47)目疾在中國南方濕熱之地尤為普遍，台灣老作家王詩琅(1908-1984)「三歲即開始患眼疾」，是為一例。(48)因為眼疾影響視力，曾限制了有些少年對某些活動的選擇。張人傑(1877-1950)十八歲時「因骨痛及目疾加甚，乃改研書畫」。是因其視力已不適繼續苦讀而然。(49)不過也有一些資料提到，士人子弟自幼常在光線不足的環境下勤讀不輟，正是使視力受損的原因。唐文治自謂七歲起，「夜課恒隨月讀書，目力已受傷害。」(50)程天放(1899-1967)也說自己「晚間也喜歡在微弱的燈光下看書，所以從十歲起，眼睛就變成近視。」(51)

齒痛有時亦困擾幼年兒童，影響正常飲食。牛運震(1706-1758)說自己「三、四歲時常齒痛，劇則一、二日不能食。」(52)還有的描述幼兒牙齒異常現象，用語簡略模糊，不易確知其意所指。如文祥自述二歲時，「甫生齒，齒亦黑」，(53)不知是否是一種幼兒的齲齒。

清代家庭還注意到有些兒童自幼有口吃的毛病，並且認為它是一種天資遲鈍的象徵。閻若璩(1636-1704)自謂六歲入小學時，「口吃」，而且「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54)但是有的兒童，其口吃的習慣並非天生，而是模仿他人學來的。柳亞子(1887-1958)九歲時「始患口吃病。系從費家五舅父樹

(44) 沈兆霖，前引書，頁2。

(45) 黃雲眉，《邵二雲先生年譜》，頁12。

(46)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頁2。

(47) 張穆，前引書，頁4。

(48) 毛一波，〈台灣老作家王詩琅〉，《傳記文學》，卷46期1，頁88。

(49) 吳相湘，〈疏財仗義的張人傑〉，《傳記文學》，卷6期2，頁32。

(50) 唐文治，前引書，頁6。

(51) 程天放，〈我的家塾生活〉，《傳記文學》，卷1期5，頁20。

(52) 蔣致中，《牛空山先生年譜》，頁2。

(53) 在此以前，文祥曾自謂「生時舌黑，火盛」故此處乃言「齒亦黑」。見文祥，前引書，頁1。

(54) 張穆，《閻潛邱先生年譜》，頁17。

達及表兄弟孟良與仲賢處學來。」並言受口吃之影響，背書困難而常遭老師責打。(55)

舊時兒童身體衛生未臻理想，易患各種皮膚病，暑熱季節尤然，前已略及。黎培敬六歲時，盛暑，即因「患頭瘍」而未入塾。(56)薛光前(1910-1978)亦自言五歲時，「頭生疥瘡，醜相可知。」(57)而且因為普遍衛生條件欠佳，富裕家庭中的兒女亦不免受蝨蚤等體外寄生蟲之苦。幼兒有頭蝨，家人即剃其髮以便清理。曾國藩的女兒曾紀芬(1853-1942)即自謂「幼時頭上常生蝨，留髮甚遲，十一歲始留髮。」(58)有的兒童所患肌膚之病更為嚴重。沈雲龍自謂年少時曾「生了一場中醫名叫『流注』的外症，最初的病症，是在出過痧疹之後，全身墳起無名的腫塊，有七處之多」，最後擴大化膿，不得不動刀割治。(59)

南方的兒童有時還有腳氣病的毛病，並無有效藥物可治，多半視其為一與環境相關之疾病，罹之則試易地療養。朱屺瞻(1892-)少年時曾患腳氣病，多方醫治無效後，遂由校「回鄉。不數日，病症豁然而愈。」此後腳氣病並未斷根，「於是病劇則歸里，愈後便返校，經常往返於上海、瀏河之間。」(60)陳寅恪少年時亦曾患腳氣病，因須易地療養，乃返家休養年餘。(61)

(二)其他影響兒童健康的因素

(1)體弱

近世一般家庭有關兒童健康的記錄，並非均具體指明其疾苦所在。許多記錄僅籠統提曰，某兒自幼體弱，因而多病。魏禧(1624-1680)之弟在「先叔兄紀略」一文中謂禧「少孱，善病」。(62)據載王昶(1724-1805)亦為「少羸，善病。」六歲時尤劇。(63)此類記錄簡略而模糊，或因家人之關注即此而止，未詳言，也可能父母家長對幼兒身體健康之認識不足，不能更詳細明確敘述。

因為身體不夠健壯，或使此等兒童的日常活動受到限制。吳梅村(1609-1671)於「奉母于太夫人七十壽序」中自謂「余自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攜，惟

(55) 柳無忌，《柳亞子年譜》，頁8。

(56) 黎承禮，前引書，頁3-4。

(57) 薛光前，〈困行憶往〉，《傳記文學》，卷32期5，頁47。

(58) 曾紀芬，《崇德老人自訂年譜》，頁11-12。

(59) 沈雲龍，〈四十年前中學時代的回憶〉，《傳記文學》，卷11期6，頁50。

(60) 馮其庸，《尹光華、朱屺瞻年譜》，頁10。

(61)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頁24-25。

(62) 溫聚民，《魏叔子年譜》，頁2。

(63) 嚴榮，《述庵先生年譜》，頁4。

祖母之力是賴，」並以年少多病疾之故，自幼鮮有戶外活動，「與子曠疏」曰：「十五、六不知門外事。」⁽⁶⁴⁾李鴻藻(1830-1897)則因「幼本瞿」，其母「惟恐致疾，令勿苦讀」，擔心他因身體瘦弱又用功過度而招疾病。⁽⁶⁵⁾

有少數的例子，幼兒之體弱是有原因的。如梁濟(1859-1918)，因「懷七月而生，故稟賦素弱」，知道他的體弱是來自先天早產。⁽⁶⁶⁾汪康年(1860-1911)則「以自始生至四歲，無日不在奔走流離之中」，遂「及長而身體羸弱」，歸因於出生後動亂遷徙，居住飲食不定，照顧不周，使他自幼健康受損。⁽⁶⁷⁾李季亦自謂其母生他是已久受生育之勞，身體極弱，產後無乳，又無固定乳母，使他自幼營養不良，發育受到影響。「幼年時常患病，枯瘦如柴，每當六月炎天，也不流汗，有時還須加夾衣。」⁽⁶⁸⁾陳其美(1878-1916)據說「初生體氣孱弱，」也與其母「產後多疾，雇乳媪乳之」有關。⁽⁶⁹⁾

然多半記錄中所載兒童體弱，並未言及明顯的緣由，只是一再提到體弱的兒童自幼易病且多病。據謂湯爾和(1878-1940)，自小「細小身量，精瘦焦黃」，而且「從小多病，一來就感冒，再不然就是下痢，成天和藥罐做伴。」⁽⁷⁰⁾郁達夫(1896-1945)父早歿，兄弟三人均賴母親撫育，達夫又「幼體弱多病」，母甚憂之。⁽⁷¹⁾趙元任(1892-1982)說自己「小時身體不好，動不動就是傷風，發燒」，害過痢疾，疝氣，傷寒等病。⁽⁷²⁾朱光潛，(1897-1986)也道「從幼年起，我就虛弱多病，大半生都在和腸胃病，內痔，關節炎以及並發的失眠症作鬥爭。」⁽⁷³⁾這類的記載，描述兒童自幼體弱多病，固然可能屬實，但是也反映了中國民間對人體健康的一種普遍觀念，認為多病，常病的人，是因為先天稟賦不強，體質較他人為弱，因而遇有小兒多病，立即與根底差，體質弱相提並論。

(2)意外傷害

舊時社會與現今一樣，對兒童健康的傷害不全來自疾病感染，人為的疏忽與

(64) 馬導源，〈吳梅村年譜〉，頁12-13;18。

(65) 劉鳳翰，李宗侗，〈李鴻藻先生年譜〉，頁4-5。

(66) 梁煥鼎，〈桂林梁先生年譜〉，頁2-3。

(67) 汪康年，〈汪穉卿先生傳記〉，頁9。

(68) 李季，前引書，頁13-14。

(69) 徐詠平，〈陳英士其美先生年譜〉，頁4。

(70) 〈湯爾和傳〉，頁2-3，6-7。

(71) 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卷24期4，頁123。

(72) 趙元任，〈早年回憶〉，〈傳記文學〉，卷15期4，頁36。

(73) 關國璋，〈中國美學播種者朱光潛〉，〈傳記文學〉，卷48期4，頁15。

意外，也常傷及其身。幼兒在家中或附近活動，摔傷跌破是免不了會發生的事。居正(1876-1951)四歲時，「抱著吃飯的磁碗學步，跌了一跤，被破碗的磁鋒將鼻尖劃出一大塊。」⁽⁷⁴⁾孫科(1891-1973)，六、七歲時騎馬，「不慎自馬背上摔下，跌破頭。」⁽⁷⁵⁾都是這類的例子。這些傷害，有些是兒童自己日常起居遊戲不慎所致，如李季自述：「小時最好活動，喜歡自己做各種玩具頑耍，如紮鞭子，削地雷公，編草龍頭，造車子等等。一日，我拿著祖父的篾刀砍一個杉樹小輪盤，預備作一張小車子，不意用力過猛，輪盤向旁邊一跳，篾刀的餘力未盡，直向我的左手中指殺來，把牠的頭砍去三分之一。」⁽⁷⁶⁾有些則是照顧的人失責所致。徐道鄰(1906-1972)襁褓時，背他的女傭不慎，背上的包袱鬆扣，使他幾乎從她背上滑下來，慌亂中她倒提道鄰的一隻小腳，硬從後肩拉回來，亦未告知其父母，待發現時，已因胯股脫臼，發炎生膿，連小便裡也帶膿了，雖經求醫診治，卻落得終生兩腿不齊之結果。⁽⁷⁷⁾有些兒童幼時不幸遭遇不只一次意外，導致種種傷害。李先聞記載他的祖父「善倫公在六歲時跌傷，發育後背駝手彎。小時又被頑皮孩子在耳邊放炮仗，把耳朵震聾了。」⁽⁷⁸⁾類似的情況，一定不在少數。而且這些偶發的意外，常造成嚴重的後果，影響兒童一生的健康。吳詠香(1912-1970)十三歲時，一個風雨之夜，「在睡夢中由床墜地，因當時無人在側，竟自暈沈睡去。翌晨醒來，兩臂不能轉動，從此遂罹骨炎，亦稱為脊椎結核病。」不但影響了她的發育，肩背亦成畸形。⁽⁷⁹⁾

傳統農村中，孩童嬉水或落水遭溺，也是常見的意外。郝更生(1899-1975)自言即因「曾游泳溺水，幾死獲救，故改名為更生。」⁽⁸⁰⁾梁寒操(1899-1975)則謂六歲以前，有一次家裡住的地方，山洪爆發，立時水深三、四尺，他為了想救一隻心愛的小貓，「跌落水中」，撈起來時已經不省人事。經置牛背上，使肚中水倒流出來，並藉牛的熱氣幫助甦醒，經過一天多的時間，才被救活。⁽⁸¹⁾

此外，兒童好動，不乏與人打鬥受傷的事。居正五歲時，「隨人放牛，與牧

(74) 趙玉明，《菩薩心腸的革命家——居正傳》，頁2。

(75) 蔣政，〈國父的先世與後裔〉，《傳記文學》，卷23期4，頁8。

(76) 李季事後道及自己處理這場小意外，並未告及家人，以當時痛不可耐，一直跑回母親房中，偷偷地將指碩的血滴在床下，然後拿一塊布包紮起來。」見李季，前引書，頁43。

(77) 徐櫻，〈我的親娘〉，《傳記文學》，卷23期5，頁43。

(78) 李先聞，前引文，頁10。

(79) 齊崧，〈女畫家吳詠香〉，《傳記文學》，卷25期3，頁34。

(80) 郝更生，〈更生小記〉，《傳記文學》，卷11期4。

(81) 梁寒操，〈回憶我在十八歲以前一些有趣的事〉，《傳記文學》，卷1期1，頁17。

童對山歌，門口打架，頭破血流，面門和嘴唇受傷，留下三處創疤。」⁽⁸²⁾

而舊時父母師長，多主嚴教，有的平常體罰孩童手法甚重，造成身體傷害，雖不謂意外，卻是一種人爲之傷害。據謂居正幼時頑皮，常受朴責，屢有血光之災。⁽⁸³⁾郭沫若(1892-1978)則記家塾中「朴作教刑」的教育方式下，相信「不打不成人，打到作官人。」塾師教刑極嚴，愛用細竹打學生，七歲左右的沫若「頭上被打得都是瘡大塊，晚上睡覺時痛得不能就枕，只好暗哭。」⁽⁸⁴⁾

(3)心理與情緒問題

近世少數有關兒童健康的記錄中，述及情緒問題對其健康的影響，顯示當時一般人對心理衛生問題的若干認識，值得注意。明末復社的主角張溥(1602-1641)因爲婢女所出，少時常受宗黨輕視，家僕之侮。據載他在長期心情鬱悶憤懣之下，不得不日夜苦讀，希望雪恥復仇，「因病鼻血」。⁽⁸⁵⁾是比較激烈的例子。

有的兒童，生活環境中某些變故或因素，使他們抑鬱不歡，雖無明顯病痛，但正常發育不無受影響，因而身體羸弱，不甚健壯。譚嗣同(1865-1898)七歲時其母藉攜伯兄南歸就婚之故，離開其北京的家園，獨留下幼年的嗣同與父及父親的新歡共處。母親離別前，雖戒令他以母思念，但嗣同拜送母親車前，目淚盈眶，而強抑不令出。從此他人問起母親，嗣同終不言，「然實內念致疾，日羸瘠。」⁽⁸⁶⁾憂思愁苦，或操心過度，會影響人的身體健康，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普遍的觀念。羅振玉(1866-1940)少年時，曾以一方面要兼理家事，二方面又要徹夜讀書，常常「雞鳴就寢」，久而久之，「遂得不寐疾」，造成了失眠的毛病，而且「羸瘠日甚」。⁽⁸⁷⁾胡漢民(1879-1936)少年時，亦以父母及一兄一姐兩弟皆以醫養不足，相繼去世，「以是常憂傷憔悴」，而致長年「體弱多病」。⁽⁸⁸⁾

當時中國民間還相信，在激憤之下，人會突然口吐鮮血。據載紐永建(1870-1965)年少時，即因「應鄉試，不售，憤而吐血。」⁽⁸⁹⁾

幼兒因受驚嚇，而大病一場，也嘗見記載。李根源年少時偕堂弟赴山上祭掃

(82) 趙玉明，前引書，頁2。

(83) 同上注。

(84) 王繼權，《郭沫若年譜》，頁6。

(85) 蔣逸雪，《張溥年譜》，頁6。

(86) 慎初堂，《瀏陽譚先生年譜》，頁3。

(87) 羅繼祖，《羅振玉年譜》，頁7。

(88)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17。

(89) 楊愷齡，《紐錫生先生永建年譜》，頁3。

祖母之墓，不意墓旁伏有兩豹，高四尺，突猛撲其前，欲攫之去。正當其驚愕失措時，兩豹竟反身搖尾而逸。然而根源「歸未二日，大病」源於驚駭，且一度昏死過去，據言彌留中經其祖宗導其魂方復甦。此後常患腹瀉，且精神萎頓。(90)

不論是憤懣、抑鬱、傷痛或受驚，少年及兒童身體健康之受損，均為情緒狀況在生理上的反映，類似今日所謂的身心症。有時心理受挫，不一定使身體不適，但會反映到其他心理與行為上的異常狀況。李抱忱(1907-1979)自謂幼時本慣用左手，但被迫強改為右手，在改手寫字的那段時間，心緒顯然十分不快，結果使他一方面脾氣變得非常急躁，另一方面竟然產生了口吃的現象。(91)

三、一般家庭處理兒童健康問題的方式

(一)自療

傳統社會中一般家庭的兒童若發生健康上的問題，並不一定會立即尋醫求治，而常設法自己照顧求癒。這是因為一則當時醫生的分佈並不普遍，許多鄉村及山間，「山僻乏醫」。(92)附近並沒有醫生或醫療設備方便民眾求診。另一方面，當時一般人並沒有病即求醫的習慣，遇到兒童罹病，常就家中已知療養方式，或求教附近鄉人朋友之建議與調養。因而過去傳記中描述兒童如何渡過疾病難關，常歸於家人辛勤調養之功。孫星衍九歲出痘，據載即賴其祖母及母親「抱持不眠者兩旬始愈。」(93)吳榮光少時「得熱疾幾殆」，亦因其母「日夕調護得瘥。」(94)李根源少年時，「嘗患腹瀉，精神萎頓，」得其「三母劉太夫人調護數月始痊。」(95)

因為一般家庭求醫不易，遇疾常以自療，兒童有病，常就家中長者之醫療常識應付之。黎培敬幼時體弱多病，三歲左右時仍常反胃吐乳，祖父甚為之憂，家人亦如其指示，「用藥嘗加厚樸少許」。(96)王闈運(1832-1916)六歲時，患病危篤，及愈，體羸弱，足不能過門限，「其曾祖母乃保抱扶持，日以白朮餌之，病

(90) 李根源，《雪生年錄》，頁11。

(91) 李抱忱，〈童年的回憶〉，《傳記文學》，卷6期3，頁36。

(92) 錢景星，前引書，頁11-12。

(93) 張昭南，前引書，頁1-2。

(94) 吳榮光，前引書，頁3。

(95) 李根源，前引書，頁11。

(96) 黎承禮，前引書，頁3。

始有瘳。」⁽⁹⁷⁾家中老人所累積的經驗和常識，常成為兒童保健之藥方或指導原則。

這種自療的情況，不獨對兒童為然，實為當時民眾對照料自己健康的一種相當普遍的態度。陳寅恪曾記他十歲居南昌時所識一陳姓傭婦，說她「終日不飲茶水，若有疾，則飲茶，一甌而愈。」⁽⁹⁸⁾

既賴自療，當時若逢友朋來訪，或旁人建議，常亦欣然接受。章乃器(1897-1977)自幼體弱常病，十四歲時，一次在餐桌上暈過去，適有「葉叔珪老伯在座，診脈，說是虛證。」⁽⁹⁹⁾伍受真(1901-1987)少年時曾得「腦漏症」，或謂「以木筆花代茶可愈，服半月許果瘳」。⁽¹⁰⁰⁾在此習俗之下，民間流傳的各種偏方和流走江湖的「鈴醫」，均可援以應付日常健康問題，雖士大夫家庭亦然。楊步偉述及自己六歲那年，五六月裡，「左眼中間長了一塊白東西，越長越大，不久右眼也有，不到三個月，全不能看見，只周圍看見點亮光」。有人傳來一個方子，囑「用象牙磨點蜜點眼睛，又吃一種叫珍珠草白燉豬肝，還得躲在門後吃，」其間親友對此疾之來由紛云不一，又有一天，看門的老蔡告訴她的母親說，「大行官地方有一個山東人擺攤子的，標明專治眼睛和賣膏藥」，家人也就依言將步偉帶去，叫那個山東人看，「他就給太陽穴內打兩針，出了兩小酒杯血」，再給了一包草藥沖水吃，據言半個月後居然就漸漸好了。⁽¹⁰¹⁾這種就便求治買藥的情況，顯然並非偶見。陳寅恪說他曾祖母一日與他閒話舊事時告訴他，過去曾患咳嗽，「適門外有以人參求售者，購服之，即愈。」雖然他祖父後來說所購得的可能是薺芎而非人參，⁽¹⁰²⁾要則其所反映的民間對疾病自行處理的態度則十分清楚。

因為慣於自療，所以地方上常流傳著一些應付兒童健康問題的方法，不求背後醫理，只要能夠靈驗。劉健群(1902-1972)即謂在產鴉片的貴州地區，一般家庭均知「瀘煙上的草紙，倒是有一最大的用途。即無管是幼童和嬰兒，凡是肚痛下痢，只要將瀘煙紙包在肚上，不到一時三刻，立刻痊愈，其效如神。」有此類

(97) 王代功，《湘倚府君年譜》，頁6-7。

(98) 蔣天樞，前引書，頁19-20。

(99) 章乃器，《七十自述》，《傳記文學》，卷39期3，頁39。

(100) 伍受真，《受真自訂年譜》，頁6-7。

(101) 趙楊步偉，前引書，頁49-50。

(102) 蔣天樞，前引書，頁14-20。

經驗為據，當時人家遇事不請醫生，一概自理。(103) 蔣君章記其祖母吸煙，逢父親幼時啼哭，「噴以煙霧則止」。(104) 但是如此自己隨意處理，當然也容易發生意外。李季自言「六、七歲時，一日肚痛大作」，父親即將他所吃的鴉片煙泡一小個給他吞服，以為可以止痛。「不意煙泡分量過重，煙性太烈」，竟使他昏迷不省人事，至一日一夜之久。(105)

(二)求醫

傳統中國社會民眾求醫行為並不普遍，有時要視當時家中景況及機緣而定。駱秉章(1793-1867)六歲那年「三月，出天花，幾至不測」，先家長似無求醫之行動，「後得鄭端州姻伯到省，請曾華麟先生用補藥，始得保全。」(106)是因適逢有親戚有事要到省城，乃央請他代替病兒向人間接求醫，當時他們求助的人，不一定是專業醫生，或許只是地方上較懂醫藥的讀書人。

這種求醫型態，原因很多，與當時醫療人員分布之不普遍，一般民眾對疾病及求醫的觀念，都有關係。還有一層原因，是當時所謂醫者，其專業知識及技術程度，有的與一般流傳民間的偏方或民俗信仰療法，似無二致。張崑三歲時，地方上「痘疫大行，街號巷哭者相繼。」崑亦患之，「顆粒曾累，體無完膚」，待家中請來醫者，「醫師謂是痘將內陷，恐不可治，姑臥之地，藉土氣以禦燥火可耳。」家人遂依言將奄奄一息的幼兒臥置地面七天七夜，並哺以米汁藥液，後乃漸有生意。(107) 病兒雖愈，而醫者所建議的臥高燒發痘之幼兒於地，可能確有藉地面降低其體溫之作用，而於病情有助。然其醫療行為表面看來，少有專業化色彩，或者亦降低了民眾心目中求醫與依傳言偏方自療的差別。齊璜(1863-1957)出生後，「身體很弱，時常鬧病，鄉間的大夫說是不能動葷腥油膩，這樣不能吃，那樣不能吃，能吃的東西就很少了。」(108) 醫者對病兒的建議，亦僅止於忌口，與一般常識無二，這類狀況，或者減少了民眾求醫的動機。

因而家人逢兒童罹病，即使向外求援，其求助的對象，僧卜丐巫，各種民俗療者皆有。這些人兼行若干治病療傷的活動，並非現代所謂的專業醫療人員，而

(103) 劉健群，〈難困少年行內〉，《傳記文學》，卷13期6，頁37。

(104) 蔣君章，〈最難報答是親恩〉，《傳記文學》，卷45期1，頁88。

(105) 李季，前引書，頁40。

(106) 駱秉章，《駱公年譜》，頁3。

(107) 鮑鼎，前引書，頁2。

(108) 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頁40。

在傳統社會的醫療活動中扮演著不可忽視之角色。陳璧(1852-1928)五歲時，「受火燙傷，病幾殆」，是靠「有丐者示以方藥，匝月而愈。」⁽¹⁰⁹⁾李宗侗記時「叔陶弟忽患抽瘋，眼睛已經翻上去，」急得他在旁邊床上大哭，家人亦不知所措。適「有人介紹薛小刀的靈藥。他的舖子在北京楊梅竹斜街，正名雅觀齋，祖傳秘方，買來一試，果然有效，不久遂愈。」⁽¹¹⁰⁾

舊時中國民眾求醫型態的另一特色，是醫卜並用，即使對醫者，亦眾醫雜取，雜方皆用，只要有效，兼容並蓄，毫無從一而終的觀念。此多元醫療文化的特色，逮清季西醫進入中國沿海市鎮後，尤為明顯。孔祥熙(1880-1967)十歲那年秋天，患疥腮，先是「請了幾位中醫吃葯敷治，一概無效，隨即成瘡潰爛，繼續蔓延」。其父焦急獨子生命攸關，乃決定送他到基督教開設的仁術醫院，接受治療，祥熙及家人先雖心存疑懼，最後仍同意住院醫治，一星期後乃完全平復。⁽¹¹¹⁾郭沫若十六歲時，據言中秋後得了腸傷寒，頭痛，下痢，咳嗽，且時時流鼻血，疲倦而無食欲。第二天在家裡先吃了「儒醫朱相臣先生的一服大熱葯」，病情反而變重。第四天乃致請「太平市的趙醫生診治，服了他的涼葯，病情轉輕，逐漸好轉。」⁽¹¹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同一個家庭，其求醫行為亦無定軌，在不同的孩童遭遇不同的健康問題時，尋求各種各類的解決辦法。楊步偉自述幼時種痘，依母親主張是用傳統吹鼻苗的辦法插苗的。六歲時得眼疾，先後用旁人傳來的偏方和門房介紹的擺攤葯販對付。待後來家中別的孩子得了疑似腥紅熱的傳染病，又決定送西式貴格醫院求診。⁽¹¹³⁾

(三)祝禱與醫禱並行

在一個多元的醫療文化下，近世中國民眾罹病不以求醫為唯一的解決途徑，加上當時人對疾病本身發生的原因，有其特殊的認定，所以在所見的有關兒童健康的資料中，常見家人以祝禱的方式，祈求解除兒童的病痛。沈兆霖六歲時患有痰疾，常因發厥而踏跌倒地，其母「黃太夫人百計祈禱，心力交瘁。」⁽¹¹⁴⁾家中

(109) 陳宗蕃，《陳蘇齋年譜》，頁1。

(110) 李宗侗，前引文，頁44。

(111) 郭榮生，《孔祥熙先生年譜》，頁9。

(112) 王繼權，前引書，頁23。

(113) 趙楊步偉，前引文，頁49-50。

(114) 沈兆霖，前引書，頁2。

長輩如此作，是因為他們視幼兒之疾苦，一如人生中之死生，災厄，禍福，認為與天意之違逆有關。所以文祥生時，「舌黑、火盛」，其祖母為之憂，乃將之「寄名於瀋陽小西關外關帝廟」，意在祈其福祐。平日有病痛，固亦延醫服藥，但終不忘以祝禱為事。文祥三歲時出天花，表面上一切順利，據謂乃背後祖母為之「焚香拜佛，額幾腫」的結果。(115) 此類禱天拜佛的活動，尤以家中孩童罹重病險疾時為最。李根源一歲時，「十二月，中驚風，舌捲牙閉，不乳，四日無啼聲，僅一息存，戚里咸謂無生理」，其祖母乃「日夜虔誦觀世音經」，據謂「第五日忽兩目轉動，微汗，啼聲大作，未服藥愈」。十一歲時，繼諸妹之後出痘，「上漿時忽漿收色黑，昏沈不醒，狀至險惡，群醫束手」，其祖母亦「虔誦觀世音經。愈三日漿忽突起，色轉紅得以治愈。」(116) 這種「死生在天」的觀念，顯然深植民間，連青少年亦以之為念。金忠潔(1610-1644) 十九歲那年冬天十二月，四弟鉉有遽疾，忠潔甚為之憂，一夕乃謂其弟鐘曰：「四弟危矣，為我裁箋來，吾為請命於天。」遂挑燈草表，再拜焚之。據言「翼日弟鉉漸有起色，不數日愈焉。」(117)

民眾祝禱求助的對象範圍很廣，從禱天拜佛，誦觀音，到祭拜各種地方神祇，乃至神仙道士，先世列祖，都在求援之列。這是因為他們相信相許多超自然的力量都可涉手人間禍福，導致兒童的疾苦與痊癒。李根源十九歲時，偕堂弟祭祖母墓，途中為豹所襲，返家後因受驚過度，而大病，一度昏死過去。據謂昏死後見其高祖對他說：「余為汝高祖，汝不應死。」並「導之復甦」。因視此死後復甦的經驗為「祖宗德蔭」所致。(118)

一般民眾不但相信上天神祇與疾病健康有關，而且在疾苦遇難時，常援引夢徵為據，以夢中所見之事為疾苦得治的緣由或指引。完顏崇實三歲出痘，據言事後「餘毒發於喉間，左右各一，危甚。」其乳母照顧，晝夜懷抱，至廢眠食，迷惘間，見一老人撫視所患，因求救治。老人曰：「此非我不能，然汝母恐。隨於鶴髦中掣寶劍出，左右割之。」其時父母驚覺，而見崇實之兩頤同時膿潰，哭始有聲。(119) 援夢治病，主要在民眾心中之信仰。李殿圖三歲時「得熱疾，幾殆。

(115) 文祥，前引書，頁1-2。

(116) 李根源，前引書，頁11。

(117) 金鐘，《金忠潔年譜》，頁4。

(118) 李根源，前引書，頁11。

(119) 崇實，前引書，頁2-3。

」其母抱持兼旬，「夜夢老人，衣冠古樸，攜白物，置几上，似粳米糕，」對母揖曰：「兒服此則瘳矣。」遂去。次日清晨，家中老奴李陞捧刀圭入，傳醫者言曰：「大相公服此則瘳。且時以西瓜湯飲之可也。」其母因刀圭與她所夢顏色分寸相符，乃述老人狀，詢其奴僕，老奴告以所夢正是過去名醫劉河間祠中之塑像也，並謂其每昭靈感云。(120)陳澧(1810-1883)十歲那年五月，患「暑病，幾死。」一方面服醫師所予大承補氣湯而愈，一方面又云「病時夢大火，中有五色輪搜身其中。」以為代表陽氣太盛，方為真正病因。(121)

因為一般民眾常以疾病與超自然的力量有關，故家人延治時所請教的人士，常兼有醫卜雙方的色彩。陸寶忠六歲時「遭瘧疾甚劇」，夏日八月稍愈，乃隨母返鄉。其時外祖母正擬赴外祖父任所，乃將遠行及外孫健康等事，一併叩問宿楞伽山岩下之一異僧，此僧據言「能知未來事」。叩之時對遠出安否之事默然不答，唯對外孫「體弱多病，能長成否」，答曰：「伊自有福，並出一膏葯，謂貼之可愈。二十日後，外祖母果因小病離世，而寶忠之瘧疾，雖拖為久瘧(稱為「病店」)，卻「以僧所畀葯貼之，漸瘳，腹中結痞亦消。」(122)

因為有這種種與疾病健康相關的民間信仰，所以在家中兒童遭遇疾病或健康攸關的時節，連家中也隨之立下一些禁忌，家人並從事各種具特殊意義的活動，均以意在避疾祈福。連十九世紀末楊步偉種人痘後，因併發嚴重後果，「發熱非常利害，天花又非常重」。所以除了一邊派八個人，日夜看守外，「全家斷葷十四天」，為之祈福。(123)

在多半家庭的觀念中，這種種祝禱求神的活動，與求醫服葯絲毫不相違悖。所以遇兒童得病，葯禱並行的例子經常可見。吳榮光六歲出痘後，遺毒聚腿腐骨，一方面用針灸法治之，一方面，其母梁太夫人「多方籲禱」達半年之久。(124)病兒得愈，家人均歸功於葯禱共同的效力。齊璜三、四歲時多病，祖母和母親一方面「滿處去請大夫，」到葯舖子裡抓葯來吃，一方面兩人三天兩朝到附近各處神廟，燒香磕頭，「常把頭磕得擊擊地響，額角紅腫突起，像個大柿子似的，回到家來。」有時還請鄉中巫師到家裡來，胡言亂語，或變把戲治病。後來齊璜病漸

(120) 錢景星，前引書，頁2-3。

(121) 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頁4。

(122) 陸寶忠，前引書，頁16。

(123) 趙楊步偉，前引文，頁24。

(124) 吳榮光，前引書，頁1。

漸好了，母親還爲之忌食葷腥油膩。(125) 黃季陸(1899-1985)也說自己小時身體不好，幼年曾患便血症，家人求助醫葯之外，生命危在旦夕時，平時虔奉觀世音菩薩的祖母，更勤於早晚燒香頂禮和默祝，成爲日課。(126) 這些例子，說明了類似祝禱的活動，常伴隨出現在近世中國家庭爲孩童治病的過程之中。

四、兒童健康的殺手

近世私人的傳記資料中，曾留下一部分兒童因病致死的例子，雖不能視爲普遍性記錄，對於瞭解當時兒童健康的一些致命傷害，仍有其參考價值。記錄中所見致兒童於死的疾病，以出痘的情況最多。可見現代以前的數百年間，中國雖有初步的防疫辦法，但天花對明清時期兒童生命的威脅仍相當嚴重。而且對年齡愈幼小的兒童殺傷力愈強。金忠潔二十歲那年六月，他的長子誕生，生後五個月左右即「以痘殤」。(127) 翁叔元(1633-1701)八歲那年三月出痘，不久年幼的妹妹亦隨而感染，母親急於照顧叔元，妹妹遂因「出痘遽驚死」。(128) 這種家中孩童彼此傳染天花，結果終有人因而夭亡的情況似乎殊爲常見。趙光(1797-1865)六歲那年三月，兄、姐、弟與光，及堂兄、表兄先後「皆患痘證」，結果他一個三歲的弟弟百祿即「以痘殤」。(129) 感染天花的兒童以三、四歲到六、七歲最多，因出痘而殤亡的也以這個年齡的孩子較多。陸寶忠十歲時，他一個剛入塾的順弟即因「十二月十九日感受溫，發疹未透」，四天之後，「二十三日黎明殤。」(130) 曾紀芬記其一位長兄楨第，「三歲，以痘殤。」(131) 蔡元培也說他的四弟及幼妹，「在三、四歲時罹痘早殤。」(132) 魯迅則謂其妹端姑，年未滿周歲即「因天花夭折。」(133)

其他常奪去兒童性命的仍以一些急性傳染病居多。像當時稱爲痧子的麻疹，或者疑似白喉的喉痺，都能在極短時間致患兒於死地。柳亞子曾謂其長妹因「患

(125) 張次溪，前引書，頁41。

(126) 黃季陸，〈我難忘的仁慈的父親〉，《傳記文學》，卷9期4，頁33。

(127) 金鏡，前引書，頁5-6。

(128) 翁叔元，《翁鐵庵年譜》，頁5-6。

(129) 趙光，《趙文恪公自訂年譜》，頁31-32。

(130) 陸寶忠，前引書，頁18-19。

(131) 曾紀芬，《崇德老人自訂年譜》，頁9。

(132) 孫常煒，《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頁1-3。

(133) 李何林，《魯迅年譜》，頁14。

痧子去世。」⁽¹³⁴⁾程滄波(1903-)亦言一位大於他兩歲的哥哥，在五歲那年，以「出痧子夭亡了。」⁽¹³⁵⁾劉健群(1902-1972)說他有一位二姐，幼年時也「因爲出麻疹而去世。」⁽¹³⁶⁾喉痺亦易致兒於死，胡林翼(1812-1861)提到他有位妻弟慧壽，「甫十歲，以喉痺殤。」⁽¹³⁷⁾楊仁山的三、四兩子，在十歲、十二歲，才入學後不久，「在三天之內，兩人同日得喉症而亡。」⁽¹³⁸⁾

其他兒童易染的急性傳染病，如下痢，腦膜炎，腥紅熱，也是醫者束手，常使幼兒夭亡。曾紀芬說她的五姐幼時「因脾虛病痢，失於調理而殤。」⁽¹³⁹⁾腦膜炎與腥紅熱是十九世紀下半期以後才有的新病名，在人口聚集的市鎮尤易傳開。居上海的顏惠慶(1877-1980)記道他的三哥，在「十四歲時，患腦膜炎夭折。」⁽¹⁴⁰⁾童軒蓀則謂弟妹兩人「以染腥紅熱，相繼死去。」⁽¹⁴¹⁾

傳統稱爲療疾的肺結核及因呼吸道感染惡化而成的肺炎，亦嘗使兒童致死。其中，結核病傷害的爲少年人，如陸寶忠記其十三歲時，十八歲的大姐在夏天「以療疾亡。」⁽¹⁴²⁾而肺炎傷害的常是幼年兒童。瞿秋白(1899-1935)的一個妹妹懋紅在三、四歲時，即「因患肺炎病死。」⁽¹⁴³⁾李煜瀛(1881-1973)記其妹「病肺殤」。⁽¹⁴⁴⁾童軒蓀記其兄因積勞得肺病夭逝。⁽¹⁴⁵⁾則均未言明是何種肺病。

綜前所述，關於近世兒童因病致死的情況，可歸結得到二項結論，一是當時一般家庭對能致兒童於死地的疾病，認識仍然相當有限。在十八世紀末以前，有關兒童病死的記錄，指明確定病名或緣故的居極少數。此後提到兒童亡故的時候，未明原因的仍然可見。究其因實以一般民眾常無法確知身邊親友究因何夭亡。此類狀況到十九世紀末仍然，徐永昌(1887-1959)述及其幼時的一段經驗，頗足以爲證。他說：

(134) 柳無忌，《柳亞子年譜》，頁9。

(135) 程滄波，〈根富老老〉，《傳記文學》，卷3期3，頁6。

(136) 劉健群，前引文，頁27。

(137)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譜》，頁22-23。

(138) 趙揚步偉，〈我的祖父〉，《傳記文學》，卷3期3，頁20。

(139) 瞿宣穎，前引書，頁9。

(140) 姚崧齡，〈顏惠慶自傳〉，《傳記文學》，卷18期2，頁13。

(141) 童軒蓀，〈梨園名優藝事及其他〉，《傳記文學》，卷18期2，頁69。

(142) 陸寶忠，前引書，頁20-21。

(143) 周永祥，《瞿秋白年譜》，頁9。

(144) 楊愷齡，《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頁9。

(145) 童軒蓀，前引文，頁69。

我小時候住大同南關牛家的宅院。此宅內外二院，各住三家。記得院新搬來一家高姓。有女十七、八歲，來時即病，不能舉步，不久死去。遲了一年半，裡院與我家很熟的吳姓十五、六歲女孩，名美人子的死了，再過半年，我的二姐死了。我二姐與美人子均清秀，不很壯碩。又過半年，外院王家，是一種地人家，有女潤子十三、四歲，很壯碩的，亦死了。又過不久，外院劉家女孩名仙子的，十二、三歲也死了。二、三年中連喪五女，年均不大（十二、三至十七、八），又不一定是傳染病（我時年幼，不知他們所患是否一個病，若是傳染病，我二姐應先傳染我，且亦不能傳染二年之久），而同院中尚有二、三女孩則仍好好的，這是偶然抑非偶然？我母傷心於二姐之死，又因我父與人家做生意，在鼓樓西街，常有病回來太遠，即在鼓樓西街找一房住，不到一年，房東太太死了，又遲半年，我兄亦死了。我母因住此傷心，又搬到泰寧觀附近某巷樊家宅院。我們住內院，外院住一開銅舖的人家，出來進去，見其太太臉黃黃的，不久死去。樊老先生有兒子，兒媳，四孫與二孫媳，其次孫媳我呼為樊二嫂的，二十歲不到，遲半年也死了。她死後幾個月，我母逝世，又過三個多月，我父逝世。短短一年多，先後又是四人。這些事故果真都是偶然麼？何以偶然的如此巧而慘怛，若非偶然，那又是什麼原因，一直到現在我莫名其妙。(146)

徐永昌的困惑，一定代表了當時多數人的心聲。

另一方面，有留有病名及死因的事例中，我們發現痘疹、痢疾、喉痺等急性傳染病似乎仍是當時扼殺兒童性命最主要的原因。若依時下公衛學中有關健康轉型(health transition)及疾病轉型(epidemic transition)的理論，則顯示當時中國社會的兒童健康狀況仍屬健康轉型及疾病轉型期以前的階段。當時尚未有現代防疫及抗生素得以控制急性傳染病，故威脅兒童健康，造成兒童死因的，仍以此類疾病居多。

五、傳統社會對兒童健康與疾病的認識與態度

從這些有關兒童健康的資料看來，近世中國士人家庭對兒童健康及疾病的問題並不是毫不重視。而且其記載中常兼及家中女孩的遭遇，可見這些家庭亦未均

(146) 徐永昌，〈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傳記文學》，卷48期5，頁11。

視女孩健康於不顧。

然而整體而言，其對兒童健康的關懷仍然受限於一般人在此方面的認識。故而一則有不少記錄，僅籠統提及家中兒童罹病有何等症狀，卻不能舉其病名。對幼兒患病的原因，更常有附會之時，所言不一定有據，如謂李殿圖「以穿花捕蝶得熱疾」，或是吳稚暉「偶因駁剔肚臍塵穢，腹絞痛三日」等病名混淆不清者有之。甚至連家中幼兒得大病，亦未及詳情，如謂傅青主七歲時「數得怪異之症」，⁽¹⁴⁷⁾或崔述十四、五歲得腹疾，對症狀、病因及療法均付闕如。一般而言，以為「無病便是福」，對日常飲食、營養，以及運動強身的觀念不是沒有，但是並不普遍。

在對整體健康及疾病認識有限的情況下，兒童健康成為其人生禍福的一部分。所以幼兒罹病，不一定急於求醫，自療之餘，求神問卜及搜羅偏方都成了避禍趨福的途徑。

家長對兒童健康的態度，則有相當功能性的取向。兒童健康出了一般性的毛病，只要不影響其正常活動，尤其是求學或生產的活動，即常置之不理。即使影響兒童本身的體力狀況，多半不以為憾。所謂羅振玉「羸弱多病，不為嬉戲」。湯化龍「體弱而強於心，無嬉戲之失。」反映的其實是成人的價值觀。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一般民眾對兒童健康的看法，有些方面與傳統幼科的認識一致，例如以生齒、長髮、能言、能行的早晚判斷其發育成長之進度等。⁽¹⁴⁸⁾但在另一方面一般民眾的處理態度則與幼科醫界迥異，例如傳統幼科一直鼓勵乳養者儘早試予副食品，增加營養，加強消化能力。⁽¹⁴⁹⁾但家長卻常對體弱幼兒延長其餵乳時間，唯恐其不能接受哺食。陳獻章以體弱，到九歲時仍「以乳代哺」，羅振玉生而羸弱，三歲冬「始免乳」，章乃器幼弱，食粥直到九歲，顯示民間父母常犯的正是傳統幼科所警戒的「過愛幼兒適足害兒」的過失。

六、結 語

近世士人所留私人及傳記資料中述及兒童健康問題者不多，但其中仍透露若干珍貴訊息。仔細檢視，乃確知消化、呼吸道疾病、天花、季節性疾病、急性傳

(147) 方聞，《傅青主先生年譜》，頁259。

(148) 可參見拙作，〈傳統中國醫界對成長發育現象之討論〉，《師大歷史學報》，期18，(1992)。

(149) 參見拙作，〈傳統中國的乳哺之道〉，《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5，(1992)。

染病，乃至耳、齒、皮膚、腳氣等雜症，確曾困擾當時兒童。此外，意外傷害及心理情緒問題亦為影響兒童健康之因素。而一般家庭遭遇兒童健康問題時，處理方式不一，常視情況或當時條件，或自療，或求醫，也不乏以祝禱或醫禱並行而求癒者，清楚反映了多元化的求醫行為模式。至於常致兒童於死的疾病，則仍以痘、疹、痢疾等急性傳染病為多。得此等常人私下所載有關兒童健康及疾病的記錄，與當時幼科醫生的醫籍與醫案並列，遂更能顯示近世中國兒童健康狀況之一斑。

書 目

- 文祥，《文文忠公年譜》（台北：廣文，1971）。
- 毛一波，〈台灣老作家王詩琅〉，《傳記文學》，卷46期1。
- 王代功，《湘倚府君年譜》（台北：廣文，1971）。
- 王先謙，《葵園自定年譜》（台北：廣文，1971）。
- 王繼權，《郭沫若年譜》。
- 方聞，《傅青主先生年譜》（台北：中華，1970）。
- 伍受真，《受真自訂年譜》（台北：文史哲，1981）。
- 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廣州，n.d.）。
- 汪康年，《汪穉卿先生傳記》（台北：廣文，1971）。
- 沈兆霖，《沈文忠公自訂年譜》（台北：廣文，1971）。
- 沈雲龍，〈四十年前中學時代的回憶〉，《傳記文學》，卷11期6。
- 杜鎮遠，《葉遐菴先生年譜》（1946）。
- 李先聞，〈一個農家子的奮鬥〉，《傳記文學》，卷14期5。
- 李何林，《魯迅年譜》（北京：人民，1981）。
- 李宗侗，〈從家塾到南開中學〉，《傳記文學》，卷4期6。
- 李抱忱，〈童年的回憶〉，《傳記文學》，卷6期3。
- 李根源，《雪生年錄》（台北：廣文，1971）。
- 李清植，《李文貞公年譜》（台北：廣文，1971）。
- 李曦，《顧炎武》。
- 完顏崇實，《惕齋年譜》（台北：廣文，1971）。
-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台北：藝文，1974）。
- 吳相湘，〈疏財仗義的張人傑〉，《傳記文學》，卷6期2。
- 吳榮光，《吳榮光自訂年譜》（香港：中國政經研究所）。
- 金鏡，《金忠潔年譜》（台北：廣文，1971）。
- 季鎮淮，《聞朱年譜》（北京：清大，1986）。
- 周永祥，《瞿秋白年譜》（廣東人民，1983）。

- 姚崧齡，〈顏惠慶自傳〉，《傳記文學》，卷18期2。
- 柳無忌，《柳亞子年譜》（北京：中國社科，1983）。
- 徐永昌，〈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傳記文學》，卷48期5。
- 徐詠平，《陳英士其美先生年譜》（台北：商務，1980）。
- 徐肅，《敝帚齋主人年譜》（台北，廣文，1971）。
- 徐櫻，〈我的親娘〉，《傳記文學》，卷23期5。
- 翁叔元，《翁鐵庵年譜》（台北：廣文，1971）。
- 唐文治，《茹經自訂年譜》（台北：廣文，1971）。
- 馬導源，《吳梅村年譜》（上海：商務，1935）。
- 孫常煒，《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
- 郝更生，〈更生小記〉，《傳記文學》，卷11期4。
- 張次溪，〈白石老人自述〉，《傳記文學》，卷3期1。
- 張昭南，《孫淵如先生年譜》。
- 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台北：廣文，1971）。
- 張穆，《閻潛邱先生年譜》（台北：廣文，1971）。
- 章乃器，〈七十自述〉，《傳記文學》，卷39期3。
-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譜》（台北：廣文，1971）。
- 梁煥鼎，《桂林梁先生年譜》（台北：廣文，1971）。
- 梁寒操，〈回憶我在十八歲以前一些有趣的事〉，《傳記文學》，卷1期1。
- 崔述，《考信錄附錄》（台北：鼎文）。
- 郭榮生，《孔祥熙先生年譜》（台北：商務，1970）。
- 陳宗蕃，《陳蘇齋年譜》（台北：廣文，1971）。
- 陳濟堂，〈陳濟堂自傳稿〉，《傳記文學》，卷25期3。
- 陳聲暨，《候官陳石遺先生年譜》（台北：廣文，1971）。
- 復旦大學，《魯迅年譜》（上海：復旦大學）。
- 陸寶忠，《陸文慎公年譜》（台北：廣文，1971）。
- 黃季陸，〈我難忘的仁慈的父親〉，《傳記文學》，卷9期4。
- 黃雲眉，《邵二雲先生年譜》（台北，廣文，1971）。
- 程天放，〈我的家塾生活〉，《傳記文學》，卷1期5。
- 曾紀芬，《崇德老人自訂年譜》（台北：廣文，1971）。

- 馮其庸，〈尹光華、朱屺瞻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
- 童軒蓀，〈梨園名優藝事及其他〉，《傳記文學》，卷18期2。
- 湯爾和，〈湯爾和傳〉。
- 楊一峰，〈童年樂事〉，《傳記文學》，卷1期5。
- 楊愷齡，〈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台北：商務，1970）。
- 楊愷齡，〈紐錫生先生永建年譜〉（台北：商務，1981）。
- 慎初堂，〈瀏陽譚先生年譜〉（台北：廣文，1971）。
- 趙元任，〈早年回憶〉，《傳記文學》，卷15期4。
- 趙光，〈趙文恪公自訂年譜〉（台北：廣文，1971）。
- 趙玉明，〈菩薩心腸的革命家—居正傳〉（台北：近代中國，1982）。
- 趙楊步偉，〈我的祖父〉，《傳記文學》，卷3期3。
- 趙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卷11期1。
- 熊秉真，〈傳統中國醫界對成長發育現象之討論〉，《師大歷史學報》，期18(1992)。
- 熊秉真，〈傳統中國的乳哺之道〉，《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5(1992)。
- 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卷24期4。
- 劉景山，〈劉景山自撰回憶錄〉，《傳記文學》，卷29期3。
- 劉健群，〈艱困少年行〉，《傳記文學》，卷14期1。
- 劉健群，〈難困少年行(六)〉，《傳記文學》，卷13期6。
- 劉鳳翰，李宗侗，〈李鴻藻先生年譜〉（台北：商務，1966）。
-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台北：中央文物，1978）。
- 蔣君章，〈最難報答是親恩〉，《傳記文學》，卷45期1。
- 蔣政，〈國父的先世與後裔〉，《傳記文學》，卷23期4。
- 蔣逸雪，〈張溥年譜〉（上海：商務，1980）。
- 蔣致中，〈牛空山先生年譜〉（上海：商務，1935）。
- 溫聚民，〈魏叔子年譜〉（台北：商務，1980）。
- 錢景星，〈露桐先生年譜〉。
- 鮑鼎，〈張夕庵先生年譜〉（台北：文海）。
- 駱秉章，〈駱秉章先生自敘年譜〉（台北：商務，1971）。
- 黎承禮，〈竹閒道人自述年譜〉（台北：廣文，1971）。

- 齊崧，〈女畫家吳詠香〉，《傳記文學》，卷25期3。
- 鍾明志，〈我的回憶〉，《傳記文學》卷17期3。
- 薛光前，〈困行憶往〉，《傳記文學》，卷32期5。
- 關志昌，〈張大千多采多姿的一生〉，《傳記文學》卷42期5。
- 關國瑄，〈中國美學播種者朱光潛〉，《傳記文學》，卷48期4。
- 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
- 羅繼祖，《羅振玉年譜》。
- 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台北：商務，1978)。